

■戲中不乏人物衝突。



步履於人們行色匆匆的香港街頭，置身於聳立的高樓大廈之間，一片車水馬龍的景象。但在這繁華鬧市的表面之下，每七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有精神問題，還有約二十萬人住在狹隘的劏房。首執導演筒的港產片新晉導演黃進，選擇了既沉重又敏感的精神病及劏房議題作為他處女作的主題，剖開社會浮華外殼下病態的眾生相，藉故事中被迫入窮途末路的人物，引導觀眾透過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而達至救贖。正如導演黃進自言：「對不起，這是一部令人看完後心情會變差的電影。」

文、攝：陳添浚 劇照由電影公司提供
場地提供：1563 at the East



■《一念無明》藉戲中父子家事隱喻都市中的病態人羣。

投身電影發掘人性

對於香港電影的未來，黃進表示在絕路中看到一絲希望曙光。「很多前輩認為香港電影的黃金盛世一去不復返。但作為港產片的新晉導演，我卻對於自己身處這個港產片時代感到很幸運，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很珍惜每個拍攝機會、珍惜這個地方的一事一物，用電影記錄這個城市的精神面貌。即便我們未必有最好的文化土壤，但我們的文化一樣可貴，一樣有我們獨特的味道。」這也是黃進當初投身電影創作的初衷：發掘屬於這個城市的人性。



■導演黃進。 陳添浚攝

徐芷君陶泥塑造流動彩虹

顏色絢麗的彩虹曾不少藝術家的靈感來源，對徐芷君 (Josephine) 來說也不例外，她在澳洲之旅時遇見了彩虹，讀數其廣闊的弧度和刹那虛實之間的流動色彩，誘發了她在藝術創作上對形態和色彩的追求。而正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Unit Gallery 展出至本月 26 日的《喜遇》系列陶藝作品，正是她向大自然致敬之餘也給自己創造的一個獨特回憶。

重複層疊 安靜思考

「在澳洲藍山第一次見到如此完整的半圓彩虹，也可能是旅行時心情特別好，感覺那種彩虹顏色自然，與在香港見到的完全不同，畫面令人震撼。」遇見那一道彩虹讓 Josephine 驚訝自然界的瞬間壯麗，明知人造之物是無法與它比擬，但一切由它而起。當她回到香港的工作室，彩虹的畫面依然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便開始着手將陶泥混成各種顏色，再將一層層的



■ Josephine 以層疊法創作，過程繁複。受訪者提供

陶泥色塊重疊，漸漸在泥塊上拼湊出不同的顏色線條。她介紹道：「我之前的作品以工整形狀及素色居多，這次則以多種顏色為主導去描述彩虹的不同形態，顏色鮮明而豐富的代表日間，相對單調的素色則代表夜晚。而當一層層的彩色陶泥重疊，很容易形成不規則的形狀，我便得它去變化。」

據 Josephine 透露，層疊陶泥的過程中稍有不慎便有空氣夾在兩層之間，這樣燒製出的成品便會凹凸不平甚至裂開。克服困難的方法？

「惟有勤力做多一點，展出的作品是 28 件，實際做的數量遠遠不止這些。」而不斷重疊陶泥的重複動作看似枯燥，卻讓她更能靜聽陶瓷撞擊的聲音，沉思而昇華內心的感受，接着隨性做出一件件立體形狀，過程像將幻變的彩虹鑲嵌在陶泥上讓它的色彩永存，使作品顯現了一種純粹性，而在她自己感覺較滿意的幾件作品中，或者呈現出如山澗峽谷般的自然流動性，或產生意想不到的奇妙色彩，這種無法掌握的微妙變化也是她愛上陶藝的原因之一。

熱愛陶藝 力量純粹

Josephine 畢業於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藝術文學士學位，主修陶藝，其後於香港浸會大學取得視覺藝術碩士學位，作品曾於不同國家和地區展出。她多年來以陶藝為表達媒介，着迷於做陶過程中那種專注與變化，以耐心細緻的態度，造就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節奏。而在視覺藝術方面進修後，使她更善於將聲音、光影等多種元素與陶瓷相結合，進一步表達感情。原來 Josephine 從小就喜歡



■ Josephine 表示偏愛流動感覺的紋理。

手作創造，選科時也曾猶豫過一陣，「後來發現陶瓷是一種很特別的媒介，它由水、火和泥土組成，燒製後的變數也更大。」她表示：「我從來都沒對未來考慮太多，想讀陶藝便選來讀，也是真心喜歡，若選擇藝術時抱着功利心考慮太多未來的出路問題，反而難以有更純粹的力量去做出好作品。我現在也有在開班教陶瓷，也常對自己的學生講『當你走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前路自然便會出現。』當然，如果政府的政策可以給年輕陶藝家更多的機會會更加好，畢竟香港現時可以辦陶藝展的場地太少了，我未來也希望有機會舉辦更多的展覽，不過更多的時候我都是安靜地在工作室創作。」她笑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 Josephine 以不規則形狀作品表達心情。

一念無明 透視憂鬱都市病態眾生相

導演

病態眾生相

《一念無明》片中余文樂飾演的阿東患有躁鬱症，因父親長年離家不顧，阿東辭去繁重的工作獨力照顧飽受病患折磨的母親。二人情緒互相牽引激化，一天，阿東拉扯間意外殺死了母親，被送入精神病院。阿東的父親、曾志偉飾演的大海在愧疚和孤獨驅使下，應醫院建議接阿東到自己的劏房暫住。兩個背負沉重罪疚感的大男人只剩下對方，但對方卻是自己最無法面對的過去。

城市人的集體躁鬱

對導演黃進來說，這既是一對父子的家事，但又像一種癌細胞一樣，擴散到整個社會。「不只是阿東，其實我們都患上一種集體躁鬱症。社會效率很高，外表光鮮，但其實大家每天營營役役，過着單調乏味的人生，從來沒有自省過自己真正的所需所想。我們不只不懂得如何與別人相處，而且還不了解自己，在這種壓抑狀態下性情變得暴戾躁鬱。」黃進如是說。所以，在電影中我們發現出現裂痕的不只是阿東和他軟弱的父親，而是整套冷漠無情的人倫關係及制度，猶如一場無止境的困獸鬥：官僚無能的精神病醫療系統、膚淺虛偽的基督教心靈雞湯、對精神病人投以奇異目光的社區基層……「公共醫院醫生因為資源人手有限，往往選擇消極保守的治療方案，處方鎮靜劑，讓病人變得呆滯，保證他們不會搗亂，但精神病人真正需要的是醫生長時間的關愛；教會宣揚大愛，但最終很可能流於一種偽善的口號；社會大眾表面文明開放，但其實因循守舊，對精神病人冷言冷語。因此，所有人都要負上責任。」

黃進認為，更可悲的是我們沒有直面問題的勇氣：「醫生以為把病人弄得呆鈍、教會講幾句大道理，或者社區的人以為把

精神病人排擠掉就可以解決問題，這一切都是掩耳盜鈴。就像近期地鐵縱火案，很多人發現縱火者有精神病記錄時就如獲至寶，以為標籤他為與我們不同的『他者』並排除在外就可以瞞天過海。」這些快餐式的答案，並不是黃進想要的。「沒有人真正去關心過那人為什麼會有精神病，也沒有人問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自己其實是不是共犯。相反，我們往往只想找一個『壞蛋代理人』，甚至像電影中那對住在劏房的母子，明明自己也是被壓迫者，但看到更弱勢的人時卻落井下石。」黃進認為，釜底抽薪的路必定很漫長：「電影中沒有一般人期待的大團圓結局，世界不會忽然間變好。我不能用一個假象去掩飾一個假象，否則這對劇本背負着的真實故事也是一種不尊重。」

魔鬼英雄一線之差

不過，黃進卻不是完全絕望，他始終深信，沒有人是徹頭徹尾的壞人。「電影海報有一句話：『我們都是對方的魔鬼，同時也是彼此的英雄』。這部電影不像警匪片般忠奸分明。每個人都是自主獨立的個體，做了好事，也做了壞事。就像精神科醫生，我本意不是要責備他們，因為他們也明白長時間的關切才真正對病人有益，只不過執行起來有很多阻力。阿東的未婚妻也是出於愛才把阿東帶去教會，只是用錯了方法，反而造成了更大傷害。」電影最後決定讓兩個男人一起互相扶持走下去：「一開始是爸爸照顧兒子，但兒子其實無大礙。後來爸爸弄傷了腳，兒子倒過來照顧爸爸。到最後兒子情緒上有困擾，爸爸又再次照顧兒子。在變幻莫測的生命裡，你永遠不知道自己下一秒鐘是照顧者還是被照顧者。」黃進認為，想這個世界變好，要靠我們自己一點一滴地做起，聚沙成塔：「結局其實在觀眾身上：

將心裡頭的糾結轉化成對身邊人的關懷。改變往往由最微小的事開始。」

黃進認為，人物是電影的靈魂，故事不是由他安放給人物，而是人物自己走出來。「《一念無明》沒有什麼大場面，講述的就是兩個人如何在狹窄的環境下生存，並重新修補他們的關係。一部電影之所以動人，正正是因為觀眾能夠將自己代入人物在故事中面對的窘境，設身處地一起分擔他們的喜怒哀樂。」他說。

與編劇女友終圓電影夢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黃進，2011 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兩奪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的譚家明是他在城大讀書時的老師，譚家明讓黃進了解到電影介入社會現實的力量，而譚家明提倡的「作者論」也是黃進一直堅持自己親身剪接的動力。

畢業後他投身電影行業，跟隨導演陳木勝擔任編劇工作。其間他曾以《三月六日》獲得 2012 年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提名。

後來他與編劇兼女友陳楚珩參加了「首部劇情片計劃」，最終入圍並獲得了二百萬元的資助，加上主演包括余文樂與曾志偉都不收片酬，黃進終於一圓導演夢。在緊絀的時間資源及空間限制下，《一念無明》只花了 16 天拍攝，大部分場景採用定點鏡頭與長鏡頭拍攝，沒有炫目的場面調度，但卻正是這種局限形成了電影獨有的局促感，呼應了電影講述社會狹仄生存空間的主題。

《一念無明》在各大電影節上映後，獲得無數影評人及觀眾的好評，黃進亦先後奪得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及第 23 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導演。此外，他又獲提名第 36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及最佳新晉導演。